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我的兩點看法

今年4月號(34期)上幾位作者就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的衝擊所作的評析頗有見地，其中翁松燃先生關於「中國威脅論」虛多於實的分析既實在又明了，而吳國光先生開出的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的藥方亦很有針對性。雖然納伊先生在問答中表明美國出於自身的利益不會實施「圍堵」政策，但正如吳先生所言：「圍堵中國」的輿論已經形成。據美國傳媒最近報導，美國民眾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人數大為減少(從今年初的49%降到了4月中旬的27%)，這似乎表明「圍堵」的政策已經有了民意基礎。而另一方面，國人對美國的強權和霸道表示反感的亦不在少數。不過，這些「民意」主要是傳媒作用下的情緒化反應而非理性思考的結果，故雙方政府若以此為藉口而採取對抗的立場將是愚蠢和可悲的。鑒於此，看來除了中美兩國領導人應保持接觸和對話外，擴大民間交流以增進人民之間的了解和信任也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順便還想就崔之元先生的觀點談點看法。崔先生熱衷從毛時代探尋有利於當今改革的

合理因素，跟有些人熱衷從《周易》中尋找現代物理思想頗為相類，但實在意義不大。因為範式不同，即使有些東西「形」雖似，但「神」卻迥異。因此，崔先生所倡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恐怕難有響應。談到思想解放，我倒覺得確有必要再來一次，但不是崔先生意義上的那種解放。經過這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實際情況與官方表面上所稱的大不一樣，如沿海的鄉鎮企業多數已實現私有化，可官方仍把它統統算作公有經濟；所謂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也早已名不副實。因此，如今確實需要有一個「小孩」來道明「皇帝」已經不再穿「舊衣」了。

鄭全民 上海

96.5.5

在局者未必清

卞悟〈淮橘為枳 出局者迷〉寫得甚好，只是我對其標題持有異議。出局者未必迷，在局者未必清。是迷是清，本和出局在局無關，此理張隆溪大作講得很透徹。關於淮橘為枳，或曰「背景與錯位」，尤須進一步探討。若某種理論旨在

否認人權自由一類普適價值，那麼它在以人權自由為原則的地方自然具反叛色彩，被認為激進；一旦用到那些正欲拒斥這些價值的地方，當然很容易為正統所用，又成了保守的東西。這並非由於移植而變了質，實其本性使之然。數十年前國人爭論共產主義便不曾注意到這一點。反對者每每說，共產理論雖好，只是不合中國國情；或曰共產理論應適用於資本主義發達之後，故不適用於資本尚不發達的今天。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看得清楚，共產理論之謬實在於自身，並不是甚麼淮橘為枳的問題。我們為甚麼不對「後學」本身來一番批判性考查呢？

艾克 紐約(美)

96.4

同情理解與互補交流

讀過劉東等人與崔之元等人的論辯後，忍不住想插嘴談點感想。雖然這極易討嫌，且在當代中國文化環境中擺明是得罪人的事，但由於這場論爭確有實質意義，又典型地屬於《二十一世紀》溝通海內外華語學術文化的宗旨內容，故願直言如下：

(1) 劉東與崔、甘爭論的問題是有意義且真實的，不僅事出有因，所論亦涉及若干重要問題。但是雙方爭論均或多或少摻入有非學術性情緒，已明顯地妨礙了交流。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似都應自覺到在反省民族文化時清理自身某些缺點

習氣(自我中心、小圈子、謀求話語權威……)的必要性。如能盡除雜念，自然會平心靜氣而增強同情性理解與分析性(而不是排斥性的獨斷)。就文風而言，我很喜歡鄒讜教授對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的評論(總33期)：徐徐道來，細緻入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幾無籠統判斷，在盡可能同情地理解對方之後，剝離出問題，由此所得出的批評結論，較易為被批評者所接受與吸納，從而積累為學術。

(2) 我以為，爭論雙方各有其合理依據與良好初衷(儘管我個人更讚許大陸學者基於本土事實的研究立場)。海外學者對古典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所介紹的新的現代化模式框架，對中國現代化是有其現實意義的。迄至今日，當代中國大陸思想界關於現代化的構思依然是以古典資本主義亦即西方現代化歷史為基本參照系，這一點自近代以來即已成深層思維定勢，大陸毛澤東主義的失敗及70年代末以來的轉向更加強化了這一定勢。李、劉二氏《告別革命》中有關經濟發展絕對優先的歷史—邏輯順序(鄒讜教授已從形式層面予以批評性分析)，客觀上亦部分落入上述格局。因此，大陸自80年代初興起的人道主義—異化風潮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含「人文超越」)討論，都不可歸諸為消極的浪漫回音，它們自有其切實的社會矛盾背景。我偏向於將海外諸新說(「制度創新」、「鄉土社會」等)視為人文超越性的

社會科學理論，其「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背景亦可支持這一判斷。

(3) 但崔、甘諸君運用西方理論框架卻未能恰當結合中國本土經驗，有些地方甚至造成了與其初衷相背且甚為嚴重的理論後果，卞悟已以嚴酷的事實作了駁論。但我不能同意那種據此視這類海外學者為輕浮教條而嘲笑甚至揣度其動機的态度。我確信並尊敬崔之元的立場態度：「中國不能夠沿着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而達到富強與民主。……」我同樣亦贊同劉東等人學理性的批評，特別是由此教訓中可能引伸出的方法論意義，那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演繹限度問題。卞悟論文的優點之一即是對事實經驗的重視，包括其更多地參照與中國有共同性的東歐改革經驗，而非援引較遙遠的西方模式，這是其論文甚少空疏的原因。

上述常識常理，崔、甘諸君當然熟知。但之所以會發生錯位誤解(某些錯位對於生活在大陸真實矛盾中的民眾來說，那簡直是殘酷的)，而且在劉東批評之後幾乎未讓人看出省察意識，這確實表明了海外學人由於脫離大陸、缺乏有關和直接經驗而受到的重要限定。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局限本身並不是不可超越的，但如果無視這一局限，不去自覺地關注大陸真實生存狀況，不是同情性地理解大陸思想界所提出的學理問題背後的真實社會經驗與問題意向，那麼，這一局限便會成為漢語學術與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缺陷。

曉林 西安

96.4.10

學術與政治

張隆溪〈多元社會中的文化批評〉(1996年2月號)一文提倡並且自己也盡量「以冷靜理性的態度來討論問題」，這對於近來出現於貴刊的頗具情緒性的論爭無疑有糾偏的功效。同時，我也欣賞作者堅守其一貫立場——一個「五四」新文化或曰現代性的立場——的態度，儘管我自己很難認同作者把現代性諸理念普適化、絕對化的簡單作法。對現代性諸價值、理念甚至其思想方式予以省思、懷疑和批評，本身並不缺乏學理依據，這一點，作者大概不會否認，他所擔憂乃至憤慨的是這套理論一入中土便轉為「保守」。這裏，所謂「保守」首先是政治上的而非學術上的。這就引出一個問題：作者所討論和批評的究竟是學術觀點還是政治行為？區分此兩者的意義在於，批評的方法與標準應當視其不同而不同，若強以政治標準去衡量和批評學術，則學術的自主性就蕩然無存。自然，我並不否認現實中有人假學術之名去作政治投機，但這與依一種學術主張的「政治表現」來作是非之論到底是不同的兩件事。許多年來，我看到各式各樣以政治上的效用對學術主張予以判斷和取捨的人和事，而被評判者的辯護也往往立足於「效用」。這足可見出學術自主的意識在我們這裏是如何欠缺。

我這樣說並非為中國的「後學」辯護，也不是假定有一種簡單的和絕對的學術自主性。我關心並且希望探究的是一種變化中的、相對於政治及其他活動領域的學術自主性：

這種自主性的內涵、限度、可能性，以及——尤其是對於今天的中國知份子來說——它的意義。

梁子 北京
96.5.22

不可忽視的另一傳統： 以聖限王

讀罷周繼旨教授的大作(總34期)，不禁想借題略言該文末談的另一傳統：以聖限王。

以聖限王傳統的最明顯、最常見的表現是儒者以儒理(聖)諫王。諫者畏聖人之言，但不畏強權，不畏帝王。儒者裏固然有許多唯唯諾諾的奴才，但亦不乏有骨氣的大丈夫。

可惜的是，在本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以聖限王的傳統全被遺棄，而聖王合一的傳

統卻惡性膨脹。不用說，其膨脹度在「文革」中為最大。「最高統帥」兼聖王於一身，不受任何限制。既然偉大領袖身兼偉大的導師，「以聖限王」的傳統資源就失掉了。那時也有極個別諫士，但他們也只能打「語錄仗」，只能從「偉大的導師」那裏尋找精神資源。

知識份子的軟骨症，是在傳統中國更嚴重呢，還是在本世紀的某些時候更嚴重？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好好深思。

周熾成 加拿大
96.5.23

西村藝術家的再現 令人興奮

在最近幾次酒會及畫展開幕式上，我們將貴刊(1996年2月號)在文化藝術圈的朋友中傳閱，大家都感到很興奮，因

為悄然消亡的藝術村又出現在人們眼前了！從去年5月到年底，藝術村在完全封鎖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被清理。藝術家們聽不到任何外援的聲音，輿論一片死寂。我們一直為藝術村做編年史，不想這段歷史那麼快就終結，於是就有投給貴刊的拙文。成文之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二十一世紀》，因為貴刊長期在文化探討上保持着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深得大陸文化人重視。貴刊認真地傾聽着大陸藝術家的心聲，又將這聲音傳播開去，對於曾經生活在西村、又被迫離開的藝術家來說，這聲音是沉默和漠視中的安慰！

金逸農 北京
96.4.5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20 侯登科：《春日》。

頁25 侯登科：《新娘》。

頁34、35 劉小軍攝。

頁39、48 胡志川編著：《中國百年攝影圖錄》(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頁37；18。

頁18、58、62、103、117、119、124、133、141、150、

155 資料室圖片。

頁69 林焱提供。

頁74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下冊(香港：東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頁607。

頁77 同上書，上冊，頁180。

頁81上、封底 《山西古建築通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頁121；115。

頁81下 Cambridge (Cambridge: The Pevensey Press, 1982), p. 85.

頁82上 Reuben A. Holden: *Yale: a pictori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頁82下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頁83上 John Prest ed.: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0.

頁83下左 Lewis C. Walmsley: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73).

頁83下右、84下 程萬里編：《中國傳統建築》(香港：萬里書店，1991)，頁35；36。

頁84上 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建築科學研究院編：《新中國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76)。

頁84中 蕭默主編：《中國80年代建築藝術》(經濟管理出版社、香港建築與城市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

頁87、88、90 董黎攝。

頁92、95 Maarten J. Chrispeels & David E. Sadava: *Plants, Genes, and Agriculture* (London & Boston: Jones and Barlett Publishers, 1994), pp. 3; 292.

頁98 *Science* **270**, 381 (20 October 1995).

頁100 *Science* **272**, 654 (3 May 1996).

頁101 *Nature* **380**, 667 (25 April 1996).

頁104 Marc Raeff: *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ver.

頁109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cover.

頁111 Jack Fincher: *Lefti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3), cover.

頁128 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前進的足跡》(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頁131。

頁136 劉溢作品。

封三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